

我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转变

郭秀清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国家安全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安全的内容、主体及实现路径三方面。在安全内容上,由军事安全转变为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的综合安全;在安全主体上,由单一的国家安全转变为包括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及人的安全的复合安全;在安全的实现路径上,由同盟策略转变为以平等协商为特征的合作安全。

〔关键词〕 国家安全,安全内容,安全主体,安全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5-0106-04

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主观认识。它包括国家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的评估,对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判断,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确定安全目标,以及具体采取何种手段来维护安全。^{〔1〕}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础,而国家安全战略则是国家安全观的主要载体。一个国家的安全观不但对自身的安危至关重要,而且也会深刻影响国际安全。尽管安全观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问题,但它一定要能体现和反映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并引领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安全实践活动向着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国家安全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安全观才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国家安全观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与完善、日益自觉与理性的发展过程。而今新安全观不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而且为促进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安全内容:由军事安全转变为综合安全

时代及其主题是确立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因素和前提,而国家利益和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则是决定国家安全内容的重要变量。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不但面临的时代及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国家利益及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日益复杂多变,与此相适应,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逐渐从传

统的政治、军事安全拓展到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由军事安全转变为综合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战争与革命”仍然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新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军事和政治领域。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捍卫新生的政权、保卫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军事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最为重要和最为有效的手段。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成功地维护了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安全,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但在这种军事安全观下,维护国家安全几乎被等同于确保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内容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都比较集中和单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家在高度重视政治安全的同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能源问题、金融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许多新的问题也纳入国家安全的视野,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得到极大丰富,形成了新安全观,也即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问题除了以主权概念为

〔收稿日期〕2011-07-20

〔作者简介〕郭秀清(1971-)女,山东济南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

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的新安全问题。而且各安全要素之间、各安全领域之间、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因此,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只有高度关注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才能达致综合安全。

中国国家安全观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变化,与时代特征的转换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变化和面临的新威胁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时代的转换意味着战争不再是国家面临的直接和经常性威胁。而在和平发展时代,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由军事竞争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在综合国力较量中取得优势,必须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确保经济安全。因此,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不再是战争威胁,而是发展问题。发展不但关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因此,从最终的“制度安全”这个战略高度出发,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的主要表现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怎样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怎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怎样才能在国际经济冲突中保证本国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等。其核心就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没有国际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没有保障。中国对于经济安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感受最深,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在这一阶段,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头等重要内容,其地位举足轻重。在1989年中国的政治安全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候,第二代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坚持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高度重视政治安全的同时,经济建设仍然被视为中国头等重要的大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明显增多。虽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重要威胁,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宗教和民族冲突、地区热点问题、恐怖主义等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交织互动,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尤其是各种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

题由于其极强的跨国性和渗透性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新的威胁。针对这一变化,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安全观即综合安全观,“中国的新安全观首先是综合安全观。当今的安全问题不再限于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已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综合性和跨国性,既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2〕不仅如此,中国对“综合安全”的内涵和本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即:对某一领域安全的追求其结果应使得大家获得互利互惠的安全,形成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良性互动。这表明中国对安全诸要素的集合性和不可分割性认识进一步深化。

综合安全观不是对军事安全观的否定,而是对军事安全观的丰富和超越,它顺应了时代主题变化的要求,准确反映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多样化的现实,指出了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及其重点所在,有利于我们维护国家各领域的安全,进而统揽国家整体安全。

二、安全主体:由单一转变为复合

安全是一种价值,必须依附于一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安全维护的是谁的安全。在传统安全观的视野里,安全就是指国家的安全,国家是安全的唯一主体。但是随着国际行为主体的增多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安全的主体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到今天,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中国安全观关于安全主体、安全价值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国际安全、人类安全和个人安全都被纳入到安全价值的视野之内,国际安全与人的安全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新主体。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生存安全面临极大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确保国家的生存安全是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主体,有能力和意愿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只有国家安全了,人的生命安全才有保障和依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解放军官兵也发自心底地维护国家的安全,自愿捐躯保国。所以,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新中国国家安全观专注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政权稳定,极少关注构成主权国家的另一个要素——人的安全。人的安全从属于国家的安全。〔3〕(P147)这一点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国对安全主体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益广泛而

密切,中国逐渐认识到,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互相影响,不可分割,不仅要维护国家安全,而且也要争取国际社会的和平,国际社会的和平需要一定的国际安全机制。从此,中国开始摆脱“零和”的安全思维,接受和重新认识国际和平和国际安全。因为中国发展、建设需要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没有稳定的国际环境,什么都搞不成”。^[4](P284)]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安全观逐步发生着新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多边外交、安全主体等开始作出新的回答。

中国对安全主体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时,中国的新安全观日益成熟和完备。新安全观鲜明表达了中国对地区安全、国际安全、人的安全等国家安全主体以外新的安全主体安全的重视和关注,其中,维护国际安全开始明确成为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新安全观认为,单个国家的安全与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紧密相连,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国家的安全已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1995年,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阐释了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他说:“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和繁荣。”^[5]这表明,不但中国对国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而且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上,进一步突出了国际安全的价值和主体地位。

对国际安全的重视和关注不仅仅是中国为了自身发展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在当代国际安全已成为中国的一种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和谐世界的提出不但是对新安全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国际安全的追求。和谐世界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享受安全和平的不仅是单个的国家,也不仅是强大的国家,而是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平等地享有安全的权利。因此,和谐世界理念不但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安全、整体安全的进一步关注,而且体现了对人类整体安全价值的新追求。

同时,新安全观也更加注重人的安全。人的安全问题是人权问题的重要内容,尽管中国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人权问题不重视。事实上,随着中国自身发展理念的变化,中国的人权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同样体现在中国的新安全观中。随着全球化迅猛发

展,跨国疫情、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国内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凸显,对普通人的生存和生命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问题“既涉及人类共同体,又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安全,所以安全战略除了考虑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还要同时顾及整个人类的安全以及每个人的安全。”在此情况下,中国党和政府对人的安全问题的关注不断提高,维护人的安全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着眼点。

中国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表达了对人的安全的关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强调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的生存安全问题。2006年3月27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中国的新安全观以共同安全为特征,高度关注国际安全和个人安全,实现了安全主体和安全价值的多元化。对其它安全主体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这一最重要的安全主体的忽视或其地位重要性的下降,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国家安全和其他安全主体的安全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有了对其他安全主体的重视和保护,国家安全才有了更好地保障。

三、实现安全的路径:由同盟策略转变为合作安全

以何种方式实现国家安全,是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传统安全观认为,军事结盟、同盟和均势等战略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但历史事实却证明,同盟本身的性质和变化性决定了此种战略无法维持国际社会的持久安全。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国际格局的二元对峙特点和新中国国力的实际状况,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上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同盟或半同盟的策略。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安全,但随着国家利益分歧的增大,此种战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

如何来实现自身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对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与根本措施等问题实现了重大转变,形成了安全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这种创新和突破突出表现在合作安全这种新的安全观方面。合作安全不同于传统的同盟或

结盟战略,是一种新型的安全模式,它强调通过平等的、渐进的、多渠道的合作、磋商而非武力手段实现安全利益,达到互惠互利。平等协商的和平性是合作安全的主要特征,它不仅可以使安全利益一致的国家坐到一起开展合作,而且允许安全利益有冲突的国家走到一起进行安全对话,因此是开放性的。合作安全不是靠牺牲本国的安全利益来委屈求全,也不是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是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不惜损害人类共同的安全利益,它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团安全。总之,合作安全倡导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超越了传统的易引发国家间对抗、敌视的结盟或同盟战略。

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安全新模式是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及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转变逐渐形成的。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对战争的态度上,邓小平曾经说过,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对如何解决国际矛盾的思考,或者说对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反思和抛弃,成为中国探索新的安全模式的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与外部的联系不断增多,中国十分重视国家间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合作安全成为中国维护自身安全、推进世界和平的首要方式。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于和平的维护更加自觉和自信,明确主张国际社会抛弃以武力求安全的做法。正如江泽民所说的,“和平不能依靠武力来实现,更不能依靠军事同盟来维持。打破国际战略平衡,发展尖端武器系统只会引发军备竞赛,危害世界和平。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只会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损害国际安全。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摒弃冷战思维,破除‘唯武器论’,各国各地区树立并贯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6〕(P535-536)尤其是当今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因素在增加,非传统威胁与传统威胁相互交织,各类问题的相关性、共同性、综合性日益增强,一国安全与地区和全球安全紧密相联。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各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像近年来越来越受重视的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全世界广泛、持久的真诚合作,只靠少数国家的努力,是根本无法应对的。美国作为全球军事能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在反恐、金融危机、防扩散等领域仍需其他国家的密切合作。而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四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合作安全模式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合作安全通过对话化解争端和避免军事冲突与战争,成为维护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实践合作安全理念增进了中国与他国的交流、交往,增强了中国与他国的互信、互利,缓解了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和“安全困境”,从而有助于地区和平与安全,使中国成为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同时,以平等互利为前提的合作安全模式,是基于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共同利益之上的安全观与安全模式,越来越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正日益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大贡献。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安全观始终坚持把握和反映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新安全观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当前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又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安全的新理念、新战略,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也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J].世界经济研究,2004(7).
- 〔2〕张永兴.中国代表在亚洲安全大会上阐述中国新安全观[EB/OL].新华网,2005-06-05.
- 〔3〕赵进军.新中国外交六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5-10-25.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周荣